

## 绪 言

本书为《河北通史》先秦卷，记述和研究的是先秦时期河北的地方史。

这里所说的先秦时期，自百万年前的泥河湾文化始，至公元前 222 年秦灭燕止，历时约有百万年之久，是河北各个历史阶段中延时长的大跨度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河北的历史，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奴隶社会阶段和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社会剧变，其地域文化，既有同全国的历史文化共融共存的一面，又有在这一特定地域、特有条件下形成的独具色彩的一面。

早在百万年前，冀北桑干河流域的阳原、怀来盆地，就留下了古人类活动的遗迹，阳原小长梁属早更新世时代的古人类打制石器文化，比北京周口店洞穴遗址的人类化石还要早二三十万年。因此这里被考古学家称为“最早人类的脚踏地”。其后的涉县新桥、阳原盆地许家窑（侯家窑）、虎头梁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遗址以及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存，标志着古人类在燕赵地域的生存繁衍，绵延不绝。泥河湾人、北京猿人、许家窑（侯家窑）人，不仅创造发明了打制石器，而且在劳动实践中发明了用火，改变了生食习俗，促进了自身体质的改善，推

动着原始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

八千年前，在冀南洛河流域的磁山，就有了北方谷作农业文化，在这里发现的石器，已是在打制与琢制的基础上磨制而成。这时的磁山人，形成了聚居村落，居住在地穴房屋，掌握了制陶技术，有了家畜家禽的饲养。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有了相当的发展，磁山人是以谷作和定居为特点农业部落。这个时期，源于华北的细石器文化，不仅在中华大地上有广泛的影响，而且在冀北通过辽西走廊，远播到东北亚和西北美。河北的磁山文化和河南的裴李岗文化是黄河流域早期的谷作农业文化，后来的仰韶、龙山文化即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

到了中华文明初曙的原始社会末期，龙山文化所揭示的社会内涵和史籍有关涿鹿、阪泉之战，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在涿鹿营建都邑等传说，显示出当时的河北同其他地区一样，社会已经处于国家形成的前夜。

夏商周时代，我国进入奴隶社会时期。“茫茫禹迹，划为九州”，河北地属冀州。夏时，相传易水流域就有了有易氏和河伯氏部落存在。夏启继夏禹为帝，就曾遭到有易氏部落的反对而引发了战争。商世的先祖在易水流域牧过牛羊，并有和易氏部落有过仇杀。商人八迁其居，在太行山东麓亦曾驻足。商王祖乙迁都于邢（今邢台市），更是古文献中的确切记载。今之邢台市和藁城市台西村，都留有商世的墓葬和遗址。当商人灭夏都殷崛起而为王朝大国的时候，今河北中南部乃是商属王畿之地，邯郸、沙丘（今广宗县西北大平台）皆有商代的“离宫别馆”；北部多为归属于商的方国部落。其中，箕、燕亳和孤竹，都是很古老的方国，虽孤处北方，但和商王朝有着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周武王伐商，遭到了孤竹伯夷、叔齐的反对；商周之际，箕子北奔朝鲜；周初分封不久，纣子武庚叛周北逃。这些

史实说明，商代的河北方国，简直是商代贵族避难图兴、生死存亡的寄托之地。可见这些北地方国的存在，对商来说是多么重要。

周人灭商，君临中原，分封开国重臣召公奭于燕，这是周王朝开国伊始的大举措，与分封姜尚、伯禽于齐、鲁一样，是着意于屏藩拱卫周王室。成王时期，又在齐、晋、燕大三角之内，分封邢国和韩国。

姬燕人凭借王权和军事进驻这里，先是在燕南京津平原立稳脚，尔后越过燕山北向、东北向拓展。燕国虽孤悬北方，却始终保有中原文化的本色，它的国势的沉浮，又和戎狄的兴衰相关，时至齐、晋崛起，燕国才有长足的发展。燕昭王招贤纳士、振邦兴国，秦开驱胡、统一辽东之后，燕国成为粟支十年、车逾千乘、骑近万匹、南临齐赵、北领五郡的北方大国。

随着周人的东迁，河北滹沱河流域出现了鲜虞、肥、鼓几个方国，在大国齐、晋（后为赵）燕间夹居而立。到战国时期，鲜虞中山已经华化为小而强劲的国家，但国运坎坷，亡而复兴、兴而又亡。

晋卿赵氏家族，早在未与韩、魏分晋立国之前，就已占有邯郸与代地。赵敬侯迁都邯郸直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是赵国历史上的大发展时期，拓土西北，征服了林胡和楼烦；消灭中山，打开了至代地的通道，一跃而崛起为东方大国。古代河北的燕、赵、中山，可谓是周封、晋裂、狄迁而有之，始于周初、终于秦的统一。河北古称燕赵始源于此。

《河北通史》先秦卷，除以相当的篇幅展现了史事沿革外，还特别注意写到了北方多民族在燕赵地域的会聚、冲突和融合，这里不仅是北方多民族的错居之地，也是中原农业经济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经济文化的衔接地带，这种既有其各自保有人文

特色的经济文化，又有其混融互吸互补的创新文化，是丰富而多彩的。虞夏之前的荤粥、獫狁，商时的土方、鬼方，周时的山戎、北狄，战国时的匈奴和东胡等都曾光顾过这一地域。

众多民族在燕赵地域的错居和交流，呈现着民族融合和统一的大趋势。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晋东伐鲜虞，齐北扫山戎；赵用兵于林胡、楼烦；燕却东胡人于辽东；赵武灵王学习“胡服骑射”，游牧民族借鉴中原的冶炼、制陶文化；中原需要游牧民族的马匹，游牧民族亦渴望中原的盐铁等等，这种互吸优长、共生存、共发展的历史，是先秦燕赵地域民族融合的主体内容。秦连接长城，灭燕赵设郡县等重大举措，也正是在燕赵统一北方多民族的基础上才得以进一步实施的。

本卷所叙史事基本上限于今河北行政区划的范围之内，但也不全部尽然。这是因为先秦时期的燕赵地域辽阔广大，赵国北边长城的终端高阙塞，已达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以北，赵国训练骑兵的基地——原阳，就在今呼和浩特市附近；燕国东北与东胡接，其长城的延伸，达到今之辽东半岛。为了忠于史实，在追叙燕赵相关史事的时候，不得不越出今日河北省的版图，北向辽西、内蒙古中南部和晋北地区延伸，特别是涉及到民族间的关系问题，需要在北方大草原的范围内寻踪觅迹。因此，本卷关于远古人类的叙述，包含了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关于燕赵中山的历史的叙述，追溯了赵国先世为晋卿的状况、燕国先燕的纪事和鲜虞中山的部落联盟。

为了便于了解河北先秦史的源流，我们还注意到了把这一地区的历史置于中国先秦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远古时，燕赵地域的土著人和周边多民族都有过交往，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和夏家店文化在这里也有分布交错。商周时代，河北地区作为统一王朝的领属之地，其政治经济必然带有从属于

中原王朝的特点。战国时代，燕赵中山也都卷入了军事的纵横之争。因此，叙说河北的先秦史事，有时不得不与全国的先秦史事相关联着写，如燕国迁都临易，是戎狄南进中原所致，戎狄南下灭国，又是和周王室的衰弱相关；中山国华化，是由于魏国的统治加速的；乐毅伐齐，又因为齐宣王干预燕国的内政所致等等。由此可见，把地域史事置于全国大时代背景下加以论述，显然是很必要的。

有关本卷的篇章结构安排，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说明。本卷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原始社会，第二章是夏商周时期，第三章是燕国，第四章是鲜虞中山国，第五章是赵国，第六章是文化。这里着重说明的是，第二章的“周”包括两周，即西周时期和东周时期。西周时期的断限和含义，人所共知。至于东周，一般认为始自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洛阳，止于公元前 256 年为秦所灭。但本卷有关东周的断限，除了包括上述时间之外，还包括了公元前 256 年为秦所灭之后直至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之前这段时期，亦即包括整个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按照这个划分，燕、中山、赵三国都属于两周时期的范围之内。我们之所以将这三国独立成章，主要是考虑到燕国和赵国是战国七雄中的两个大国，燕国自西周初年至战国末年一直存在，更是历时悠久；中山则是仅次于七雄的二等诸侯，号称“千乘之国”。在公元前 296 年中山灭亡之前，战国时期今河北地区就三分于燕、中山、赵三国之内。燕国是两周时期的主要同姓封国，鲜虞中山是春秋时期北方的重要少数民族方国，燕国、中山、赵国是战国时期具有相当实力的诸侯国，对当时的战国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三国的并立因此而构成河北先秦时期地方史的特色。而且在资料上，有关三国的材料也相对较多和系统，因此我们将三国各为一章，而将其它封国、方国统统归入“两周时期的河

北方国部族”部分，作为第三章的一节。

关于鲜虞中山国一章的结构和内容，这里也需要特别说明。中山国的历史研究历来是一个薄弱环节，这主要是因为资料太少。集中反映中山国有关资料的书籍只有刘向编订的《战国策》一书，专门列有《中山策》九章近 4 万字的内容。司马迁《史记》的“世家”之所以不列中山，除了中山国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不及战国七雄之外，资料太少可能也是一个因素。但是随着 70 年代以来有关中山国考古工作的进展，这一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变。1974 年冬，考古工作者在平山县三汲乡一带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中山国的都城古灵寿城，发掘了 30 余座墓葬，出土了各种文物达两万余件，其中有三件铜器带有长达数百字的铭文。这些文物展出，特别是铭文刊布之后，立刻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历史、古文字学界的极大重视，一时间形成了研究中山国历史和文化的热潮，先后出版、发表了数十部、篇论著。这些研究成果结合史籍记载和考古材料，梳理了有关中山国的史实和王系，勾画出了中山国的基本轮廓，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中山国历史知之甚少或知之不详的状况。本章内容即主要依据这些研究成果整理而成。

20 年来的研究成果为本书清理中山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提供了可能，但由于资料太少，也造成了研究者对有关史料认识的分歧，有些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对立观点，这就使本章在吸收有关的研究成果时常常面临难以取舍的困境。例如鲜虞与中山国的关系，西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认为战国的中山即春秋时期的鲜虞，近代以来的学术界对此分歧很大，李学勤、李零、段连勤等认为战国中山国既非周之同姓，亦非魏所别封，而

是春秋时期白狄所建的鲜虞国的继续。黄盛璋、何直刚、田卫平等认为战国中山国与春秋狄族所建立的鲜虞既非一国，亦非一姓。战国中山国的历史与春秋鲜虞不相连续。<sup>②</sup>鲜虞与中山是否前后相承，关系到中山国的来源及其早期历史从何时算起的问题，按理说不应回避，然而这又是本章所无法也无力解决的问题。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有关中山国的问题，本章暂且将春秋时期的鲜虞包括在中山国历史之内。这一点需要特别说明。

本卷第五章（赵国部分）的初稿为魏建震撰写，我们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增删和调整。

见李学勤、李零：《中山三器与中山国史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

见黄盛璋：《关于战国中山国墓葬若干问题》，《考古》1980年第5期；何直刚：《中山国史杂考》，《河北学刊》1985年第3期；田卫平：《中山历史与文化 概貌、性质、地位》，《石家庄历史文化》1997年第1期；刘超英：《战国中山族属浅议》，《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 第一章 原始社会时期的河北

### 第一节 原始群时期古人类在河北的活动

#### 一、河北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

原始社会分为两个时期，原始群时期和氏族公社时期。这时人类使用的主要劳动工具是石器，因此也叫做石器时代。石器时代又分为两个阶段：使用比较粗糙的打制石器的阶段叫做旧石器时代，这包括了原始群时期和氏族公社的初期；使用磨制石器的阶段叫做新石器时代，这包括了氏族公社的发展、繁荣时期，直到青铜器时代开始之时。

原始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原始社会的低级阶段。它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但比较松散。当时，人类的生产能力很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很弱，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获得一些生活资料，抵御猛兽或其他自然灾害的侵袭。原始群的成员共同劳动，共同消费，以采集植物的果实、根、茎和猎取鸟兽为生活资料；主要居住在山洞之中。

原始群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原始群前期和原始群后期。人类学家根据原始人类的体质形态进化程度，把原始社会时期的

人类分为猿人、古人和新人三个阶段。原始群前期的社会主人是猿人，原始群后期的主人是古人，新人属于现代人类型。原始群时期的人类已不再属于猿类，其体质形态正处于进化之中，类人猿的体质形态诸特征趋于减少，现代人的体质形态诸特征正在形成。

我国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古人类是约 170 万年前的元谋人（不包括有争议的“东方人”、“蝴蝶人”）他同后来的蓝田人、北京人同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在社会形态上处于原始群前期。在河北范围内，这一时期除了北京猿人之外，尚未发现猿人化石，但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屡有发现。这些遗址都集中在冀西北的阳原盆地，有东谷坨、小长梁、半山、岑家湾、马梁等遗址，代表性地点是小长梁、东谷坨文化。这是目前所知河北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时间约在 100 万年前。因此，考察河北境内人类活动的起源，就不能不首先介绍阳原盆地。

**阳原盆地的自然环境** 阳原盆地地处冀西北，包括阳原、宣化、涿鹿、怀来、蔚县一带，为北东向狭长的构造断陷盆地。北为熊耳山，主峰黄花梁，海拔 2036 米，南系恒山余脉，中部为广阔的湖积平原。桑干河自西南而东北流经整个盆地，至盆地东缘，穿越石匣口，经宣化、涿鹿，注入今怀来官厅水库。其支流壶流河经蔚县后在盆地东部小渡口村附近汇入桑干河。在盆地东部边缘区可见到元古代变质火山碎屑岩系，中生代侏罗系紫红色角砾岩和新生代上新统“三趾马红土”堆积，其他部位多为发育良好的第四纪堆积，即红土层之上黄土层之下相间的河湖堆积，名为泥河湾地层。泥河湾层常被晚更新世形成的黄土或全新世以来形成的松散砂砾层覆盖。在盆地边缘山前地带，存在着宽阔的洪积扇。盆地西部略平坦，东部地势差异较大，剥蚀严重，乃至裸露出基岩。阳原盆地在地质学上属于早

更新世沉积，泥河湾地层含有丰富的动物化石、人类化石或文化遗物。泥河湾位于阳原盆地桑干河上游，为一湖相堆积，由细砂和泥灰质土等组成。泥河湾第四系地层发育良好，以盛产哺乳动物化石闻名于世，重要的哺乳动物化石有三门马、梅氏犀、剑齿虎、中国鬣狗和低鼯鼠等。

可以想象，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介于蒙古、东北寒温带、温带区域与华南亚热带区域之间的过渡地带的阳原盆地，既有密布的河湖，又有疏林的草原，气候凉爽，水草丰美，是各类哺乳动物自由栖息的天堂，为人类的出现提供了适宜的自然环境。

泥河湾地层的发现 泥河湾是阳原县东部石匣里乡的一个小村庄，位于桑干河北岸。1924年，英国学者巴尔博在这里进行地质考察和化石采集工作时，发现泥河湾和桑干河南岸的地层有淡水双壳蚌化石，他由此推断这一带曾经是一个较大的湖泊。巴尔博考虑到这个含有双壳蚌化石的地层特殊，于是给了个地层学的名称，叫做“泥河湾层”。1924年至1927年间。外国天主教牧师桑志华、德日进等来到泥河湾传教，在这里发现许多哺乳类动物化石。1930年，德日进和另一位科学工作者皮维托，对泥河湾层的哺乳动物化石作了深入研究，发表了《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一书，认为产化石的地层时代为第三纪上更新世晚期。1948年，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认为欧洲维持拉方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层的时代，属第四纪更新世早期。1954年，在纪念北京人发现25周年的会上，中国地质界采纳了这一建议，正式把相当于欧洲“维拉方期”的我国“泥河湾层”也放到了早更新世。从此，泥河湾这一带含有哺乳动物和厚壳蚌化石的河湖相地层就成了华北地区更新世早期的标准地层。被广泛用于我国北方乃至亚洲和世界范围的地层对比和研究。

泥河湾地层的发现，揭示了探讨河北以致全国范围内人类早期活动的广阔前景，第四纪是地质学和地质史的一个概念，约指 250 万年前至今这样一个时间范围，它又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称为“更新世”约从 250 万年前延至 1.5 万年前；晚期称为“全新世”约从 1.5 万年前延至现在。第四纪是地球上生命和生物发展的重要阶段，科学界已经公认，本纪初期是现代人类祖先——猿人出现的时代，所以也称为“灵生纪”。泥河湾属于早更新世，这里又发现大量的哺乳类动物化石，无疑预示着产生早期人类的可能。1935 年，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根据在下沙沟（位于泥河湾东北）采集到的似有人工痕迹的石块和动物化石标本，就推测泥河湾一带可能有过古人类生存。因此从那时候起，在阳原盆地的泥河湾地层发现早期人类的遗迹只是一个时间的早晚问题而已。

小长梁遗址和东谷坨遗址 小长梁遗址位于阳原桑干河南岸大田洼乡官亭村北 500 米处 与北岸的泥河湾村遥遥相对。东谷坨位于小长梁东。1978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第四纪组的科学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属于泥河湾层的旧石器和大量的哺乳类动物化石。文化遗物包括石核、石片、石器以及制作石器时废弃的石块共计 804 件，<sup>①</sup> 另有若干人工打击和刻痕的骨片。制作石器的原料以各种颜色的燧石为主，其余则为脉石英、石英岩和水晶等。原料来自东部的凤凰山。石器的类型有砍砸器、单刃、复刃刮削器，尖状器、锥具、雕刻器等。特点是器类较复杂、形体较小，打片采用锤击和砸击两种方法。哺乳动物化石有古菱齿象、三门马、三趾马、披毛犀、羚羊、野牛、鬣狗、狼、中华鼯鼠、熊等。小长梁遗址和东谷

<sup>①</sup> 一说小长梁出土近 2000 件石器。

坨遗址的文化层年代，经古地磁测定距今 100 万年左右，大致相当于早更新世末期。<sup>①</sup>从层位对比看，它早于山西芮城西候度和云南元谋人文化层，是我国目前境内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由于小长梁和东谷坨地点相近，特征相似，同处于泥河湾层的早期，属于同一文化类型。因此考古学界统称为“小长梁和东谷坨文化”<sup>②</sup>。

小长梁遗址和东谷坨遗址以及其它旧石器遗址的发现，起码具有两个意义：第一，证实了早更新世时期泥河湾一带曾经生活过早期人类的推测。自从 1935 年步日耶推测泥河湾一带可能有过古人类生存以后，许多人否定在华北地区有寻找早更新世的人类化石和石器的可能，只有少数人如贾兰坡、王健等认为“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sup>③</sup>。从 1972 年开始，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阳原泥河湾一带不断从事第四纪早更新世到晚更新世属于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发掘。1974 年，盖培、卫奇报道了他们在泥河湾村西北七百米的下沙嘴发现一块具有清楚人工痕迹的石器。这一报道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但对于地层的时代问题尚仍未获得一致的看法。小长梁遗址的发现，是我国旧石器考古学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肯定了早更新世时期泥河湾一带曾经生活过早期人类，而这些远古的祖先又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文化遗物。这样，大约半个世纪留下的悬案终于得到了确切的回答。

第二，为进一步寻找早期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泥河湾地层发现的旧石器虽然证实了早期人类在河

郑绍宗：《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的主要收获》，《文物春秋》1989 年创刊号。

卫奇：《东谷坨旧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1985 年第 4 卷第 4 期。

贾兰坡：《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科学通报》1975 年第 1 期。

北地区的活动，但由于没有发现人类化石，当时人类的体质如何，婚姻状况如何，社会形态怎样，均不得而知。不过，阳原盆地和泥河湾地层独特的地理地貌和自然环境既然已经留下了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那么能够更进一步揭示早期人类状况的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发现，就绝对不是遥远的将来，所以考古学界大都对它寄以厚望，认为“它是解决华北地区远古人类起源的最具备条件最有希望的地方之一”<sup>①</sup>。可以预见：泥河湾地层发现人类化石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另外，泥河湾早期人类遗迹的发现，还为探索后来的“北京猿人”的来源提供了某种可能的线索，北京人化石的发现地周口店同泥河湾的直线距离仅 90 公里，两处著名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如此相近，不能不使人将两地先后出现的人类活动联系起来考虑，贾兰坡研究认为，“东谷坨遗址的石器加工技术和北京人的石器有相似之处，可以归于同一传统。从种种迹象看，东谷坨的时代无疑早于北京人的时代。从两个时代的石器的密切关系来看，北京人打制石器的技术很可能是来源于东谷坨”<sup>②</sup>。至少可以说，泥河湾地层人类的遗迹的发现已经使二者的关系初显端倪。

总之，小长梁遗址和东谷坨遗址是河北境内最早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它的发现表明，早在 100 多万年以前，原始人类已经生活、劳动在阳原盆地一带，他们既是中华大地上第一批先民的群体之一，也是目前所知河北地区最早的开拓者。

郑绍宗：《河北考古发现研究与展望》，《文物春秋》1992 年增刊。

张森水：《周口店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周口店精神》，《文物春秋》1989 年第 3 期。

贾兰坡根据多年的研究，认为泥河湾盆地的小长梁遗址出土的石器，是距今 160 万年前人类使用的工具，属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旧石器文化。他根据石器加工的精细程度，推断当时的人类已经具有相应的语言。

## 二、人类的进化和活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泥河湾地层文化虽然已经表明 100 多万年前的人类已经在河北大地上留下了自己活动的遗迹，但当时人类体质特征怎样、人类社会结构的具体形式如何，人类进化和活动范围是否有所变化，人们并不清楚。北京猿人化石和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及涉县新桥遗址等的发现，为了解这些情况提供了确凿的资料。

北京猿人 旧称“中国猿人”又称“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北京猿人化石于 1927 年首次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堆积层中发现。1929 年 12 月由考古学家裴文中（1904—1982 年）发现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1949 年以后，又陆续发现北京猿人化石和众多的石器，至今共发现的人骨化石包括男女老幼在内的 40 个以上的个体，发现的石器达 10 多万件。经古地磁等方法对洞穴的堆积层测定，北京猿人洞穴的文化堆积年代从 70 万年至 23 万年。根据目前已经发现的人类化石的层位，北京猿人是从 50 多万年前开始生活于此，前后经历约 30 万年。

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为认识当时人类的体质和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体质特征方面，北京人已经脱离猿类而进入早期人类阶段。北京人遗址所发现的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共 6 个，另有头骨碎片 12 件，下颌骨 15 件，牙齿 157 枚以及其他大量的骨骼化石。经专家研究：北京人体格健壮、骨骼粗大、肌脊发达、身材较矮。整个脑颅较扁，最宽处在外耳

门上方，头骨壁较厚，约比现代人厚一倍，脑量小，成年人平均脑量为 1088 毫升。头盖低平，额骨后倾，眉骨嵴粗大，左右两眉骨互相连接，向前突出，遮盖双眼。下颏骨最大特点为吻缘前伸，下颏缺乏，多颜孔。牙齿的构造复杂、硕大。上中门齿的舌面有发育的底突，分成几个指状突，上下大齿的齿冠和齿根粗大、齿冠从侧面看呈楔形，上、下前臼齿和上、下臼齿不仅比现代人的粗大，而且嚼面有相当多的皱纹。北京人的肱骨和股骨从形态上看基本与现代人相似，但髓腔小，骨壁厚，股骨比肱骨更具原始性。从整体上看，北京人的身体近于现代人，而头部则具有较多的猿的性状。因此被称之为“猿人”。尽管北京人还保留着一些猿的性状，但他们的下肢骨基本具有现代人的形态，能够直立行走，上肢已发展成为能够制造工具的手；头骨脑膜语言区部位隆起，已经会说话，能够运用语言交流，具有一定的思维能力。这表明北京人在漫长的岁月中，已经通过劳动而最终从动物群中分离出来。

北京人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遗物是石器。在洞穴遗址已发现 10 万多件石器，制作石器的原料以脉石英为最多，绿色砂岩次之，燧石、水晶石和蛋白石最少。北京人制造石器在多数情况下分两道工序，先打出石片，而后从中选坯，进而加工成器。从石核和石片的打击痕迹，可以看出北京人打制石片使用三种方法：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并已初步懂得对不同石料采用不同的打片方法，用砸击法生产小型的石英片、用碰砧法打出大的砂岩石片，用锤击法生产各种大小不等的石片。北京人制作的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锥、球形器等等。刮削器是北京人使用最多的工具之一。尖状器是北京人制作最精致的工具，其中：有向一面加工的，特点是沿着石片的两侧边缘从阳面向背面把一端修成尖状，有向两面错向加工

的，特点是先打击石片的一侧边缘，然后再从另一侧边缘向相反的一面打击，把一端打制成尖状，虽有直刃和斜尖之分，但加工方法是一致的。关于北京人使用骨器的问题，自从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于 1931 年提出在遗址存在骨器以来，在学术界有人赞成，有人持异议。经过多年研究，中国学者贾兰坡、李济、张森水诸位均持肯定意见，北京人曾制作和使用过骨器，但数量不多。

北京人已经知道火的运用与管理。在北京人的洞穴遗址里发现有 5 个灰烬层和 3 个灰堆遗存以及大量的烧骨、烧过的鹿角、朴树子，还有少量烧过的土块和木炭。灰烬层在第 10 层仅厚几十厘米，到第 4—5 层厚达 6 米，这说明北京人保存火种的能力不断增强，也说明这种火是有控制的，能把火控制在一定范围而不致蔓延，已经具有管理火的能力。北京人能够用火和管理火，意义十分重大：有了火便可以熟食，熟食有利于人类体质的进化，促进身体和大脑的发育；用火还可以御寒和照明，有利于生存；在洞口生火，可以防止野兽的侵袭，保障群体的安全。从北京人所处的人类阶段来看，北京人还没有掌握人工取火的技术，使用的是自然火种，因此保存火种在当时非常重要。

从社会发展阶段看，北京人正处于原始群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原始群前期。这个时期，人类大约由十几个或几十个人结为一群，居住在山洞中，无论是采集、狩猎或从事其它活动，都是以群为单位进行。《吕氏春秋·恃君览》所谓“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其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大概就是对这种原始群社会关系的写照。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北京人的经济生活只能依靠采集和狩猎。主要是采集一些植物的根、茎、果实和捡

拾一些鸵鸟蛋等等。在狩猎方面也只能猎取些不太凶猛的野兽，如鹿、羊、鼠类等，有时也捕捉一些鸟类充饥。根据周口店洞穴中所发现的大批古生物化石，如披毛犀、毛象、剑齿虎、赤鹿、水牛、野马、野猪、鬣狗、水獭及貂之类，可知周口店的自然环境较现在温暖湿润，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活动着众多的动物，山上有林木花果，坡地有洞穴石岩，平川有草原流水。山坡洞穴，可以作为避风雨防野兽的栖息之所；山林、水泽、草原，可以提供果实和猎物。这样的环境为北京人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此，采集、狩猎和穴居野处构成了北京人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特点。

北京人的婚姻状态还处于杂交时期，当时的人类还处在幼年时期，由于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婚姻形态也很原始。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没有什么限制，属于杂交阶段，这是人类最早的、最原始的婚姻形态。随着社会的演进，人类的婚姻形态也在发展，逐渐改变了这种原始状态。

许家窑（侯家窑）遗址 许家窑位于山西省阳高县东部梨益沟西侧断崖上，东南紧接河北省阳原县侯家窑，两地仅隔一条沟。（1974—1977年发掘的073113号地点即属于许家窑，0744093号地点属于阳原县侯家窑。）遗址埋藏在距地表8~12米深的阳原盆地河湖相沉积层中。1973年至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多次发掘，两个地点共发现人类化石17件，石器近2万件及众多的骨角器，并出土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经采用铀系法测定许家窑6个动物牙齿化石样品，这里的人类化石属晚更新世晚期的后一阶段，即旧石器中期。年代为距今10万年左右。也有的学者认为年代属于华北地区旧石器早期末或中期初，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末或晚更新世初。考古学界通称为许家窑（侯家窑）文化。